

※序跋選錄※

《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 轉換期之文藝現象》導言* (一)

劉苑如**

「採詩觀風」、「知人論世」在中國都具有長遠的傳統，它原是古代知識分子考察禮治的途徑、施行教化的法門，然這種透過士人心態的中介，上以掌握整個思想文化的潮流，下以理解社會生活狀態，正符應了傳統中國人特殊的文學期盼，達到社會功能與道德美感交融的美學標準，而成爲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方法之一。此一轉化的契機何在？發展如何？在世變方般的二十世紀曲終之際，我們重審「世變」與「創化」的關係，又是立足在什麼樣的基點上？這不僅關涉到重寫文學史的課題，在解析本書中所收錄的前六篇論文，描述其研究路徑之際，又何嘗不是爲本世紀末的臺灣學術發展寫下一個註腳。

從兩漢開始，隨著舊有文學資產的日益膨脹，以及時人對未來文學走向的詮量，這些新的時代議題皆與文學的淵源流變密切相關，成爲當時人亟需面對的現實問題，於是「觀風」、「論世」原來爲政教目的所做的時代觀察，逐漸轉化爲解釋文學變遷的手段，而有「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毛詩序〉）之類的文變論述因應而生。及至漢魏之際，儒家桎梏的崩解，以及個人才性的覺醒，加速了文學自覺的萌生，和各體文學的全

* 《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爲本所「中國文哲專刊」第十七種，已於八十九年五月出版，本論文集共收錄十三篇論文，篇章排列循時代先後以及論題範圍依次而下，上起漢魏六朝，下及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囊括了中國歷史上的兩大變局，在「世變」與「創化」的共同主題貫串下，渾然爲一書；然以時代議題與論述興趣而論，該書又可獨立畫分爲二，故本書採雙導言的方式，分別介紹漢唐、唐宋兩個時期的相關論文，並指陳出該研究群組的研究成果與特色。

** 本所助研究員。

面發展，文學流變的議題由原先被視為政治興衰的表徵漸趨集中在現象本身的描述，作家們在踵世增華、競獻新猷的創作歷程中，實際歸納出「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質文時異，則既論文」（〈文章流別志論〉）的變化規律。至劉勰《文心雕龍》則更對各體的文學發展都作了溯源求本的工夫，細密地勾勒出「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通變〉）的文學沿革歷程，並試圖從根本上找到文章訛變的原因，而總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的文學發展規律。至此，文章因時而變的論述得到全面的認識與接受，成為最普遍的文學常識之一。

在復古、新變與通變的抉擇中，劉勰作為一個文學理論家，當時的時代任務與其說在揭示文學發展的規律，毋寧說在調解文學價值轉變所引發的衝突。而這種價值轉換的時代氛圍，並非朝夕之間形成，蜂屋邦夫教授〈六朝時代宗教與思想之演變〉一文，首先以大歷史的觀點，為這場山雨欲來的文學革命預作了思想背景的說明。他指出，六朝本是儒・佛・道三教關係孕育，各種藝術開花結果的時代。而這些各有旨趣、互有矛盾的文化果實如何接枝在同一母株上？蜂屋教授從當時三教紛呈的文化思潮與現象中，萃煉出「游離現實」的共同分子，作為全篇論述的基調。他追溯道：早在後漢仲長統的〈樂志論〉等文章裏，亟欲超越現實，悠游於觀念世界的心境就已躍然紙上，而逸民隱棲山谷，採藥為生，正是悖離儒家宰制、傾向老子處世態度的日常實踐。魏時開展出全新的玄學時代，王弼以聖人為「至無」，在此儒道共同的語彙上，創造出受容佛教「覺者」思想的基礎，並且將人生理想從現實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展望「自由」；而竹林七賢等人則是逃入莊子的世界，展現玄學式的生活；西晉王衍「貴無論」，以精湛的辯論術增添了莊學的影響力；而郭象《莊子注》則從理論上證成自足安分世界的合理性。東晉延續「高世」風潮，然內涵已有所轉向，玄虛的「個」沈浸在江南的山水之美中，並透過道、佛二教注入了新意：如《黃庭經》從人體構造的閉鎖世界完成自我；「空」或「般若」提示了「彼岸」的觀念，以慰藉自足安分也無法制約的不安，並從理論構造及實踐體系上，將「個」定位於現實之中；而孫綽〈遊天台山賦并序〉追求與自然的冥合，乃是佛教恍惚之境的智性推進體系；至於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揭示從王者統治的現實桎梏中游離出來的主張，從而超越了果報的情，以獲得完全的自由；然他的「神」不滅觀念，則主張超越自然，而與老莊玄虛的走向畫清了界線。經由蜂屋教授重點式的論述，勾勒出六朝儒道佛三家在理論建構與生活實踐上，依違於六朝

現實世界之間，彼此挪用、相互排斥的演變圖式。

鄭奠子教授的〈自然：魏晉文人在世變中追求的超越〉同樣以宏觀式的論述，提出「自然」——這樣一個兼通儒道、存心養性、安身立命的經驗實體，作為貫串魏晉文人精神、情感與理性上的種種探求，和因應哲學、歷史、政治多方變局的共同依歸，也即是透過對大自然的標榜，領會生生不息、逍遙欣樂的自然之道，進而成全物我情契的自然之性。然魏晉文人所鍾的自然課題，終究不算是開風氣之先，早在上古時代已成為傳統中國人生活與意識中的一部分，魏晉人對於自然之道、自然之性的體悟，以至於自然之境的呈現究竟有何獨特之處？鄭教授因而大幅度地考察從上古到魏晉自然觀的發展歷程，他認為，魏晉以前，詩人往往擷取自然中某些片段和成分，以此物象化出某種勸勉的警策之意，來言志抒情；直到漢末曹操的〈觀滄海〉，大自然的開闊壯大才首次成為獨立觀照的實體，激盪起主體高遠的精神氣魄；不過詩人對自然全面的體驗仍有待東晉時期的發展。另一方面，山水景物結合老莊之學的體驗，用以登臨玩賞、化愁解悶，寧神養性，也在兩漢政治變亂，宦海生波之際已萌發，到魏晉時期，回歸自然的隱逸之風愈發盛行，並與仙道追求結合，自然景象的描寫有時帶點靈異虛幻的味道，使得一個飽含形神超越意味的大自然逐漸成為魏晉時期藝術創造和學術思維的焦點。也即是說，魏晉文人藉由契合老莊、玩味山水、崇尚隱逸和採藥求仙等文化行為來體驗自然，進而感發了魏晉文人隱逸、遊仙、玄言、山水及田園詩文創作，而這些詩文又凝聚及深化了自然體驗，尤其到了東晉末年，陶淵明已將哲學上的宇宙與生命中的人性自然及田園山水的景物自然，連在一起領會，真正達到萬物為一的超越境界，也成為傳統文士在歷史世變或個人變遷的困惑中所追求的依歸。

上述兩篇論文基本的論述方式，都是緊扣著當時的各種文化活動，說明漢魏六朝文人如何在變亂中抗拒現實，形成各自應世的理念形態與行為模式，文學雖有其重要性，但仍將其視為眾多文化活動中的一環來加以考察。接下來的四篇論文，則比較側重在文學現象的詮釋：李豐楙教授的〈嚴肅與遊戲：六朝詩人的兩種精神面向〉採時代精神的宏觀視野，以嚴肅與遊戲兩種精神面向驗證六朝世變與文變的因果關係。他首先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檢討魏晉南北朝在世變情境下所激發的集體創造力，一方面表現在末世心靈圖象的怪異書寫；一方面表現在名題的學養與創意，也即是在傳承中必須有所創新。經由名題的分析中，發現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等魏晉詩人由於個人的不遇，被迫游離於體制之外，而在個人文學活動中承

繼春秋戰國憂世的嚴肅創作態度，主題趨向孤獨、憂鬱；相對來說，活躍於文學集團的南朝詩人，藉由社交性、娛樂性的文學遊戲，每每在題材、文辭上強調「新變」，作為技藝競比的標準，而精神面向上也往往必須進入自由忘我的「放蕩」情境。然而，李教授強調，亂世多故固使詩人多以嚴肅的態度抒情詠懷；而偏安時局的文學遊戲又何嘗不是苦中作樂？嚴肅與遊戲原是創作心態一體之兩面，凡此皆反映了不同變局下的文人感覺，涉及了文學趣味的起伏與朝代末的時代氣氛，各自造就文學史上的不同的新頁，其價值不宜偏廢。

另外三篇青壯派的作品，則採單點突破的論述策略，鄭毓瑜教授的〈歸反的回音——漢晉行旅賦的地理論述〉，透過「放逐」為主題的漢魏行旅賦，論述劉歆、班彪、蔡邕、潘岳和謝靈運等人如何以時空建構對抗放逐的人生；劉苑如博士的〈六朝漢武系列的「小說」試探〉，分析三部以「漢武帝」為母題的六朝小說，說明當時漢武傳說多聲重唱的原因與意義；鄭文惠教授〈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新探〉，藉由〈桃花源記〉與〈詩〉一體化之形式和話語結構，解析「樂園化」桃花源文化景觀的淵源與其創意。三文都是從同一題旨或母題出發，展現文學創化的軌跡，而旨趣與方法又各有所不同：

鄭毓瑜教授以屈原「放逐之旅」的文學典型為起點，取「地理論述」這個切面，考察漢晉行旅賦在「放逐／反放逐」文學上的模擬與創新，以及透過「離／返」楚騷的書寫行動，劉歆、班彪、蔡邕、潘岳、謝靈運等賦家如何建構屬於一己安身立命、持志處心的地理圖誌。在討論方式上，大致遵循著體式結構與創作背景的雙重比較，前者尤其著重行旅賦與苑獵賦在「體國經野」意義上的交錯離合；後者深入探討漢晉間行旅賦作者如何由沈湎於帝國想像至於銘刻祖德家風的情境移轉。這些作品顯然不僅是呈現文學史上體類相從與演變的現象而已，同時在論述形式上也體現出文化象徵體系與社會權力的運作標記。而這一連串辭賦作品所形成的對生存領域的層曲回應，也正是漢晉文士真切體受世局變遷而不斷翻修、重建的「新地理志」。

劉文以小敘述眾聲合唱的角度，重讀六朝漢武系列中三部志怪作品《漢武洞冥記》、《漢武內傳》與《漢武故事》。經由外緣考證與文本解讀的交互辯證，發現在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歷史變局中，漢武傳說在民間不斷的傳播、對話與滋生，遠超越了歷史大敘述所建構的修齊治平的聖王典範的思維，三部看似雷同的作品，在同一題材的限制之下，分別從「職貢圖」由一統多的視點、「聖徒傳」現實與超

現實雜揉的敘述時間，和「歷史舊事」前後相貫、同類相繫的編纂方式中擷取養分，創造出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敘述觀點，演繹出萬國朝貢、天下歸一的聖王／宗教對話中的求道者／憂患人生中的摸索者等三種迥異的生命形態，因應各自的存在危機，形成自我消解的政治、宗教與歷史話語。這些斷裂、片面，甚至相互齟齬的敘述話語，既無意也毋需取代歷史的大敘述，而是在「漢武」符碼的多義性中，尋求各自表述的論述空間，體現出志怪叢談的末世風情。

鄭文惠教授則運用讀者反應理論、美學、民俗學、神話學等觀點，分析〈記〉、〈詩〉「遠遊式」結構之敘事形式與「追尋式」母題之表意內涵，如何透過〈記〉、〈詩〉不同文類的並置、交疊、指涉、對話而逐一彰顯出「出發—歷程—迷失—死亡—回歸」之話語結構及淵明「本我—自我—超我」之生命進程。此外，該文亦從「水源」、「舟」與「桃花林」等審美意象的文化脈絡，試圖掘發〈記〉、〈詩〉所呈現之集體無意識，並從陶氏天師道之信仰歷程，發現桃花源樂園化世界實與道教配合村落共同體制與家族組織體制所建構之道治組織具有同構關係，而歸結出〈記〉、〈詩〉建構出之「樂園化」桃花源文化景觀，大抵是陶氏在其宗教信仰、家鄉化地域性記憶與文化思維結構下，為中世紀生命共同體謀求理想化社會所構造的新圖景。因此，「樂園化」之桃花源典型環境，不但可視為其追求完美價值所產生的「應然世界圖象」、生命回歸的精神原鄉，亦是中世紀社會世界的理想圖式。

經由上述學者不同層次的檢討，可以發現「世變」的多重意涵，世變固然意謂著朝代更替，作為一種時間座標，或用以區隔文學歷史的流變，或用以統合本處計畫中幾個天崩地裂的歷史時期，但它毋寧更代表著一種價值轉化、世情的變遷。以漢魏六朝時期來說，這種價值的變化一部分根源於政治變局所造成的個人去處、環境遷移與生死存亡的浮動感，一部分由於道、佛等新的價值體系的加入，另外，更關係到整個社會結構的結構性變遷，也即是士族門閥社會的興起造成時代氛圍感覺結構、生活型態的不變，進而經由想像世界與社會權力的交涉運作，促成集體心態、社會政治觀念的全面轉變。凡此尚可逐一推溯，然談到世變所牽動的事端則是千頭萬緒，難以盡述，而黑格爾（Hegel）所倡導的「時代精神」（Zeitgeist），正可化繁為簡，一語道盡時代變遷的精神所在，故至今仍為觀風、論世者所習用的方法，像是蜂屋教授點出的「游離現實」的心境，鄭教授揭出「自然」的課題，以及李教授所櫟括「嚴肅與遊戲」兩種精神取向，對於這個時期的價值轉化的取向都具有相當的解釋力，呈顯出這一代學者對系統知識、中心話語的信賴。相對於此，

鄭毓瑜教授不僅將世變視為客觀的歷史變遷，更與作者主觀的時空建構、生命體驗一併考慮；劉苑如博士解構漢武論述的獨一性，鋪陳世變中衆聲喧譁的文化景觀，凡此則可見世紀末的問題意識隱然浮現。

其次，談到文學流變的問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研究議題的設定，其重點逐步由過去「變」因、「變」跡等直線對應式「變」的掌握，漸趨於兼顧到「變」與「不變」交織的部分，也即是新變中方向轉折與速率變換的問題，探討如何在舊有的題材或體式中往復回旋，推陳出新。從本文所討論的諸篇文章中可發現，無論是自然的課題、不遇之感、放逐主題、漢武帝母題，或是遠遊結構、追尋母題，在漢魏六朝已非首見，時人推陳出新的工夫，與其說在揚棄，不如說在於深化、融合、挪用與錯置，在頓挫的生命主題中，容攝新的時代感受與審美情趣，因此本論文集多見舊瓶新酒之作，然其論述仍是屢見新意。二是詮釋的轉向，六朝復古、新變與通變發展方向的價值考量，在現今重新還原為認知的議題，詩騷雅言、抒情言志的傳統固然有其歷久彌新的閱讀價值，巧言形似、爭妍競新的遊戲筆墨，或是怪異非常的志怪書寫，以至於不同文類間的交互影響所形成的變體，在本書的研究中逐漸獲得較多的重視，持平地從其開創性、表現力與歷史情境中給予新的解釋與評價。

在新與舊裏交融，異與同中錯雜，變與不變間周旋，不僅勾畫出漢魏六朝世變與文變行進的軌跡，同時也組合成上述六篇論文共同旋律。